

# 从深沉雄大到熠熠生辉

## 读“汉画 汉风 汉魂——山东汉画像石艺术展”

张露胜 徐文辰 宋爱平



汉画像石是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石刻构件,是我国古代为丧葬礼俗服务的一种独特艺术形式。它融合绘画与雕刻的艺术表现手法,生动展现了汉代人的现实生活与浪漫想象。山东地区的汉画像石内容丰富、水平精湛,是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在世界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

“汉画 汉魂——山东汉画像石艺术展”经过9个月的精心筹备及2个多月的施工布展,于10月24日在山东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图1)。展览共展出珍贵汉代石刻文物77件/组,辅以石刻拓片、文物线图以及数字化资源,展示了汉画像石研究的最新成果。通过“汉画像石解读”“神道石刻”“汉画祠堂”“汉画墓室”四个单元,全景式阐释了汉代墓葬建筑系统,展现了神道石刻、祠堂、墓室的全貌及其建筑形制,讲述了画像石中神仙祥瑞、忠臣孝子的传奇故事,揭示了汉画的艺术之美、气势雄浑的大气韵味、汉代人的精神信仰。

展览采用空间叙事的手法组织架构,在有限的展示空间巧妙还原汉代墓葬建筑系统。展览复原的莒南孙氏阙、金乡朱鲋石室、嘉祥宋山祠堂等重要汉代建筑是叙事的基本单位,意在将单体画像石还原到建筑的空间语境中,去阐释祠石在建筑中的作用及其画像的隐喻。此外,展览按照汉代陵墓的配置去划分展示空间。在展厅中分割出一条横向贯穿的通道作为意向化的神道,以非对称布局设置了石兽、石阙、石人、石碑等(图2),神道的终点指向朱鲋石室,伏羲祠数字展项呼应背面的沂南北寨汉墓虚拟漫游展项。展品、展项间的空间关系与汉代的陵墓礼制相吻合。

### 千秋:汉画像石解读

汉画像石是大汉王朝厚葬风俗的产物,承载着深厚的齐鲁文化底蕴,展现了汉代社会的生活风貌与礼仪习俗。古朴而宏大的艺术风貌,开放而自信的时代精神,赓续两千余载,历久弥新。山东的汉画像石早在北魏时期就被众多金石学家研究著录,历经千年的摹写与考述,传承至今。



图3



图4

**东汉石狮(图3)** 石狮于临淄出土,整体呈跪姿,昂首张口,目视前方,双耳竖起,颈粗腰细,背部隆起,身形矫健。颈部有浮雕的鬃,并刻有隶书铭文一行:“雒(洛)阳中门外刘氏所师(狮)子一双。”铭文记载了工匠姓名及籍贯。东汉墓前有配置大型石兽的习俗,基本形态大多源自狮、虎、豹等猛兽,不少更接近狮子造型。

### 路公食堂画像石(图4)

此石刻于东汉永元元年(89年),早年山东汶上县出土,后为曲阜孔氏所得,继归山东金石保存所。石已残,图像采用凹面线刻,内容为车骑向左前行,前面一车仅露车的后半部分,后随二骑和双马驾驶的辚车。图像右边有隶书题记二行:“元元年二月廿日口口口口(荆)(路)公昆弟/口服三年立食堂路公治平氏春秋不踰”。

### 守望:神道石刻

神道是指墓前开辟的贯通式道路。西汉时期开始在陵墓神道放置具有守护、辟邪功能的石刻,及至东汉,神道石刻制度逐渐完善,中轴排列、对称设置石柱、石阙、石兽、石人、石碑,展现出汉代石刻的秩序性与艺术性。山东是汉代墓地建筑类型最齐全的地区,各类陵墓石刻均有发现,其配置布局延续至明清时期。

**“邪相刘”神道柱(图5)** 此柱由清金石学家尹彭寿发现于济南章丘区龙山街道孙家村,1930年入藏山东金石保存所,为汉琅琊相刘君墓前神道柱。柱为束竹式,上、中、下部各有一圈绳纹状束带,上部篆书,仅残留“邪相刘”三字。柱身中部两侧各浮雕一螭虎,突出部分亦残。另一侧有尹彭寿题记,内容为:“是表字三行,可见者‘邪相刘’三字,盖汉刘衡见,参以衡碑文而知之。年久表倾,其后刘汉告余,重立墓前。光绪丁酉秋,古琅琊尹彭寿记。历城周锡诚刻。”

**莒南孙氏阙(图6)** 此阙造于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是现存最早的纪年石阙。1965年出土于莒南北园镇东兰墩村,1983年拨交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此阙整体为重檐方形屋顶、梯形阙身的单阙,阙身为汉碑碣造型。阙右侧刻隶书一行:“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仲父物故行丧如礼刻作石阙贾值万五千”。

**陶洛村捧盾石人(图7)** 1957年,石人出土于山东曲阜陶洛村,通高2.21米,躬身站立,着长袍连袂,头戴武弁大冠,内衬巾幘,双手捧盾。此类石人立于墓前,成对出现,一人捧盾,一人执戟,躬身而立,应是墓前的亭长、门卒之类,具有仪卫、侍从等功用。

### 追远:汉画祠堂

汉画像石祠堂为形似房屋而前部不设门扉的建筑,又称“食堂”“斋祠”等,是子孙后代祭祀、追思祖先的地方。祠堂画像除了彰显孝心,接受祭拜外,路人也能瞻瞻,兼具纪念和教化功能。山东发现的祠堂建筑数量最多,大、中、小各种形制皆备,图像丰富,制作精美。



图7



图2

### 朱鲋石室(图8)

东汉朱鲋石室出土于金乡县李楼村,门洞高2.25米,室内面阔3.96米,进深3.3米,属单檐双开间悬山顶式建筑,是可复原的最大的汉画像祠堂。祠堂三壁由石板纵向拼砌而成,立石侧面的凹槽扣合严密,每壁正中雕刻凸起的立柱,上部设炉斗。朱鲋石室最早著录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兖州府运河同知黄易与金乡县令马于釜发掘出因河水泛滥而淹没的朱鲋石室。1927年,金乡人周文奎将石室有画像的三壁石板迁移到县城文庙明伦堂保存。1934年,美国学者费慰梅调查了金乡县城保存的原石及原址墓葬,于1942年发表了石祠复原方案。



图8

### 宋山一号祠堂(图9)

宋山一号祠堂为东汉晚期平顶式祠堂,现存祠堂东、西侧壁,后壁,盖顶石,屋顶残石,基座石六块画像石刻,除屋顶石外,皆采用凸面线刻。1978年至1979年,祠堂构石发现于嘉祥县满洞公社宋山大队村的三座墓葬中,墓室为石室再建墓,构石属多座汉代石祠。蒋英炬先生将散石复原为四座平顶式祠堂,其中一号祠堂构石较齐全,展现了此类祠堂的形制和全貌。

### 孔子见老子画像石(图10)

此石于嘉祥县洪家庙出土,先由嘉祥县令吴蔚年搜罗至嘉祥学宫明伦堂,再于1909年运至山东金石保存所。画像中持拐杖者为老子,躬身执鞭者为孔子,中间推鸡车的小童为项橐。项橐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位神童,《战国策》记载“夫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后世尊项橐为圣公。

**永寿三年(157年)许安国祠堂画像石(图11)** 此石出自嘉祥县满洞公社宋山大队村墓葬,原为祠堂顶盖石,画像采用铲地平面线刻,中心为“方花”,花瓣上刻连笔鸟字纹,花瓣间空隙处刻六条鱼、二人头鸟。画面左右两侧各有铭文,右刻隶书题记十一行近五百字,记录了许安国病逝及族人“竭孝行”修筑石祠的过程,表达了亲人的悲痛,其对石祠内部画像的描述精妙细致,颇具文采,有汉赋之风。

图10

图11



## 金步摇·双马镜与文化交融

刘宁

2024年9月5日,“龙城之金:辽宁三燕文物选萃,337-436”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秋季特展在美国纽约开幕。这是个里程碑式的展览,首次在美展出来自“龙城”(今辽宁朝阳)近七十年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包括陶器、青铜器、砚台、印章、马具、壁画摹本,以及众多金饰品,展览还配有全彩插图精美图录。展期至2025年1月5日。

魏晋十六国时期(公元4-5世纪),在中国北方地区的鲜卑族慕容氏相继建立了前燕和后燕,鲜卑化汉人冯氏建立了北燕。前燕、后燕、北燕三个政权合称“三燕”,“三燕”均以龙城为都城,形成了以龙城为中心分布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三燕文化”遗存以鲜卑族慕容氏部分为主体,受到了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多元交汇且独具特色的文化面貌。出土了以“步摇”为代表的“三燕”金器,以“木芯钉卷金铜片马镜”为代表的“三燕”甲骑具装和丰富多彩的“三燕”壁画等一大批震惊世人的艺术珍品。“三燕”不仅创造了自己的历史,还推动了古代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交流,影响了中国北方地区的社会发展,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展览由辽宁省博物馆联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朝阳市博物馆共同遴选展品,集结辽宁省内三燕文物精品101件/组,力求展品丰富充实,全面展现三燕文化的面貌。展览分为“多元的三燕文化”“三燕的壁画艺术”“三燕的金饰艺术”“三燕的马具艺术”四个部分,生动展现“三燕龙城”的独特魅力,让美国民众有机会了解和欣赏一千多年前东北民族的独特历史珍品,了解“三燕”历史,感受兼收并蓄、多元包容的中华文明。

三燕文化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结果,展览中的文物处处体现着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印迹。如本次展出的金步摇,有1957年辽宁北票房山出土的早期步摇,以及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金步摇冠。金步摇是慕容鲜卑特有的一种冠饰,是以花树状枝干上缠绕桃形金叶形成,不同于中国古代妇女使用的一种名为“步摇”的发饰。这种金属摇叶装饰源于西亚,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随北方游牧民族南传入,流行于辽西地区,成为三燕文化的显著特征。并经辽东半岛东传,朝鲜半岛三国时期的皇南大冢、瑞凤冢、金冠冢均出土了金步摇冠,日本藤之木古坟也出土了缀有摇叶的鍍金铜冠。

与步摇冠相配的还有金玦,反映了中原文化对慕容鲜卑的影响。金玦是汉晋以来高级官吏特用的冠前饰物,是一种等级的徽识。考古发现的有方形金玦,玦面多缀以金叶;山形金玦,玦面常附蝉纹为饰。蝉在古代被认为是“居高食洁”“清虚识变”的象征,佩戴者是以蝉纹表达自己高尚的德操。帝王的冠冕,菩萨的冠前亦见有蝉纹金玦。这种装饰品体现了中原文化、佛教文化与鲜卑文化的交互融合过程。

展品中有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一枚“范阳公章”龟钮金印,龟壳的两侧刻有双钱连接的圆圈,象征着南斗、北斗星宿。与同墓出土的“辽西公章”“车骑大将军章”“大司马章”三枚印章确认了墓主人是北燕宰相冯素弗。据《晋书·冯跋载记》,冯素弗是北燕皇帝冯跋之弟,助兄建立北燕政权,封范阳公,拜侍中、车骑大将军、录尚书事,后改封辽西公,任大司马职,治理北燕,居功厥伟。卒于北燕太平七年(415年),由此也确认了墓葬的年代。慕容鲜卑从慕容廆始,逐渐建立起一套官爵体系和相关制度,基本上和魏晋以来相一致。印制是官制的反映,北燕冯素弗四枚印章,说明这种以材质划分品级的官印制度由汉经魏晋直至前、后燕以至北燕都相沿未改,随葬明器印是中原丧葬文化的特点之一。

展览还展示了目前所知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一对马镜。马镜,尤其是双镜的应用,标志着骑乘用马具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双马镜的发明,改变了骑兵和战争的方式,使得骑兵战士将双脚踏入马镜后,便可腾出双手用于战斗。这对出土于冯素弗墓中的马镜由富有韧性的桑木和鍍金青铜饰片制成,代表了十六国时期北燕的鍍金工艺和马镜制作水平。发明马镜的重要性,一如历史学家罗伯特·坦普尔在其著作《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Inner Traditions, 2007)所述:“当我们想到中世纪的欧洲时,我们会想到身穿铠甲、手持重矛

的骑士,但没有马镜,这些沉重的骑士很容易从马上跌落。正是中国发明的马镜使得西方中世纪骑士成为可能,并带来了骑士精神的时代。”目前发现的三燕文化的马镜,除北燕冯素弗双镜外,基本都与高桥鞍共出。高鞍桥是马鞍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东汉后期的所谓“鍍鞍鞍”或“金鍍鞍”就是一种高鞍桥。三燕文化的高鞍桥多有鍍金或进行精细雕刻的鍍金金属包片。装备了改进的高鞍桥马鞍和马镜,才有可能使身披重铠的骑兵能够控御体披重铠的战马,才有可能组建以甲骑具装为主体的军队。

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还体现在1965年从冯素弗墓中出土的五件玻璃器中,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出土的最早、数量最多的一组玻璃器。这批玻璃器由无模吹制工艺制成,均为碳酸钠玻璃,属于罗马玻璃。这些玻璃器很可能是从罗马帝国的东北省份沿丝绸之路带入北燕,行程跨越了欧亚大陆草原地带。自西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后,大批的西域胡人或经商、或通使,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原地区。魏晋十六国时期的辽西地区是中原、东北腹地、北方草原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是连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重要环节。辽西与北方草原的文化交流发生很早,前燕政权中已经有胡人活动了,据《魏书·安周传》记载,辽东胡人安周,其祖先先是粟特地区的安国人,魏晋时避乱到辽东,其父安周任前燕慕容暐的殿中郎将,这是辽海地区有西域胡人活动的最早文献记录。三燕文化遗物中的西域文化因素,还体现在金器的加工工艺、金属摇叶装饰上,而且三燕马具装饰纹样中的多方连续纹、对凤纹等都与西域和欧亚草原文化有关。金属摇叶装饰起源于西亚,3-5世纪在辽西地区特别流行,除用于冠上的金步摇外,在带具、耳饰、马具上也都用摇叶作装饰。大小不一、质地不同的金属摇叶,成为三燕文化的显著特征。三燕文化鍍金鞍桥包片,多为内饰龙、凤、鹿等多方连续龟背纹,以及对凤(对兽)的图案,都与西域和欧亚草原文化有关,通过游牧于北方草原的慕容鲜卑等南迁一同传入辽西地区的。

本次展览形象地再现了一千六百多年前辽东人的生活和文化。“三燕”文化是古代辽西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以东晋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文化为主体,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形成的多元交汇且独具特色的文化面貌。其历史发展过程,既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也是汉民族与鲜卑民族之间的一次民族大融合的过程。

东晋十六国时期,各民族不断发展、融合,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本次展览是辽宁省博物馆积极推动辽西地域文化“走出去”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开启更多探讨中华文明文脉传承与中西方文化交流对话的平台,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国故事。

本次展览是继2008年“末帝宝鉴:辽宁省博物馆藏清宫散佚明清书画”展后,辽宁省博物馆第二次赴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文物展览。“这个独特的展览,展示了已被历史遗忘的三燕文化,也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当年的丝路交通,无疑激发并丰富了沿途的文化。”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馆长海蔚表示,“正如当今世界,文化交流是促进相互理解和进步的最重要的桥梁。在我三十多年为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策展展展过程中,我一直想有个展览能够阐述这一重要主题,我很高兴‘龙城之金’特展使我如愿以偿。”

(下转7版)